



邵炳军 主编

诗经与礼制研究

刘石笔



(第一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172)阶段性研究成果

诗经与礼制研究

(第一辑)

邵炳军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与礼制研究. 第一辑/邵炳军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5671-3663-2

I. ①诗… II. ①邵… III. ①《诗经》—诗歌研究②
礼仪—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222
②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0025 号

责任编辑 贾素慧

出版统筹 邹西礼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钱字坤

诗经与礼制研究

(第一辑)

邵炳军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upress.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字数 328 千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3663-2/I·543 定价 120.00 元

学术顾问：

蒋 凡 庄亚洲(中国台湾) 董乃斌 陈戌国 谢维扬

主编：邵炳军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韩经太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启荣(美国)

学术委员会委员：

张懋镕 徐志啸 李笑野 周 锋

王 铨 罗立刚 邓声国

林素英(中国台湾) 陈 致(中国澳门)

田中和夫(日本) 方秀洁(加拿大)

劳悦强(新加坡) 潘碧华(马来西亚)

编辑委员会：

邵炳军 徐正英 王 铨 罗家湘 马银琴 宁镇疆 朱 承

责任编辑：邹西礼 贾素慧

执行编辑：刘加锋

封面题签：刘 石

序

王长华

上海大学邵炳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诗经》与礼制研究”，自2016年11月立项以来研究工作推进顺利，课题组不断推出高水平的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也陆续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果。据课题组统计，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出版学术著作1部，发表学术论文50篇。其中，30篇刊发在《哲学研究》《历史研究》《学术月刊》《江海学刊》《中州学刊》《广东社会科学》《清华大学学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郑州大学学报》及《光明日报》等颇具影响力的报刊上，8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文学研究文摘》《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先秦、秦汉史》等刊物全文转载或文摘、摘要，3篇入选全国社科规划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期检查阶段性成果代表性论文。日前，课题组拟将25篇代表作，以重大项目名称“《诗经》与礼制研究”为题结集出版。邵炳军教授嘱余作序，不能推辞，下面略谈个人的阅读体会。

从总体上看，目前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能够恪守从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的方法论原则，以《诗经》礼制类诗歌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诗经》与先秦礼制相融互渗现象的深入考辨，探寻《诗经》的创作、结集、传播历程与先秦礼制的生成、定型、流变历程之间的共生互动关系，探究华夏“诗礼文化”的历史内涵、生成机制、传播方式及其流变规律，发掘其在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独特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中国传统礼制的生成、定型、流变与诗礼文化的当代传承”这一重大问题。具体地说，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传统礼制的生成、定型及流变

礼制是构成华夏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它既包括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也包括民间层面的风俗习惯，涉及祭祀、丧葬、朝觐、会同、聘问、田猎、饮食、婚冠、

燕飧、养老、优老、讽谏、教育等多方面的礼仪规范,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功能。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因素,影响着经济基础,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进步与社会文明。因此这一研究层面属于本项目的基础性研究内容。如邵炳军《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中州学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文学研究文摘》《学术界》),旨在通过分析春秋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化倾向关注点的不同,反映出诗礼互动内涵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进而揭示诗礼文化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内在动力;《“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上海大学学报》),从自西周初期开始“德”观念逐步完成了由“天德”向“人德”的转变视角,来探讨春秋时期诫勉诗演化的历史轨迹,认为“敬德”思想观念成为诫勉诗创作动机生发的思想根基,“诰教”与“慎独”方法则分别对他诫类诗歌与自诫类诗歌创作动机的生发产生了直接影响。

马银琴《诗乐互动中的〈诗〉》(《光明日报》),从周代《诗》与礼关联互动关系入手,探讨“诗礼文化”生成、定型、流变的基本路径;《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清华大学学报》《新华文摘》),从探讨有关“风”的诸多概念发生流变的视角,认为“风”与“音”“律”关联而具有指向歌声、曲调的意义,再由“风言”“风听”“风议”产生了“风刺”——不着痕迹、委婉曲折的言说方式,从而产生了最早的“风”诗。这对于探讨“风”诗与礼制的共生互动关系是很有价值的。

王锸《周礼与〈诗经〉关系探析》(《广东社会科学》),旨在说明《诗经》是一种艺术化的礼制,由此在“诗礼相依”的双向动态运动中构成了“诗礼文化”,并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内核之一;罗姝《从春秋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看诗歌创作方式的转变》(《中州学刊》),从西周时代的“献诗”“采诗”制度由服务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至春秋时期逐步转变为服务于“听于民”的政治目的入手,来讨论与这一转变相伴而生的由诗、乐、舞三因素合一,逐渐向诗与乐、舞二因素脱离的转变,诗歌创作方式随之开始由集体创作逐渐转化为个人创作。

二、《诗经》与“五礼”“五伦”的共生互动

就《诗经》的社会功能而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故为治国之本、立身之基、人伦之要;就其与礼乐关系而论,“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记·孔子闲居》载孔丘语),即诗为礼的表现

形态,礼为诗的精神内核,故“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载孔丘语)。而《诗经》所具有的仪式乐歌作用、礼乐文饰作用,以及诗教功能都缘于其与礼的密切关系。其中“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等所谓“五礼”,属于周代礼仪制度规范的核心内容;“君(王)臣”“父(母)子”“兄弟”“夫妇”“朋友”等所谓“五伦”,属于周代伦理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故该研究层面属于本项目关键性研究内容。

本书所收论文中如邵炳军《从〈椒聊〉〈蟋蟀〉〈山有枢〉看春秋前期晋国礼仪制度规范的基本态势》(《广东社会科学》),旨在从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的“五礼”,来探讨特定区域在特定时段内“诗礼文化”构成的核心元素;徐正英《“风”与“礼”》(《光明日报》),以“风”诗为例,以“嘉礼”为个案,探究周代《诗经》与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的礼制——“五礼”之间的共生互动;罗家湘、王璠《饥饿体验与荒礼救护——〈诗经〉凶礼研究之一》(《郑州大学学报》《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通过对《诗经》作品中透露出来的“荒礼”信息,展示出周人通过“荒礼”以“聚万民”的基本状况,进而说明礼仪规范对于安定人心与稳定社会秩序的社会功能;杨秀礼《〈周易〉“丧马”为“反马”婚俗考论》(《郑州大学学报》),将《周易》“丧马”与“反马”勾连,展现了周人婚礼过程中的“反马”婚俗——将新妇所乘之马返还娘家,此正与《诗经》《左传》相印证;吕树明《〈诗经〉“吉礼”类农祭乐歌的叙事结构形态发微》(《中州学刊》),从《诗经》“吉礼”类农祭乐歌叙事结构多元化形态的生成视角,来讨论该类诗歌作品通过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丰富性来强化沟通与协调天人关系的社会功能,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诗礼文化生成的艺术路径。

宁镇疆《也论“余一人”问题》(《历史研究》),从结构解析、卜辞用例及其含义、泛称与专称等层面,讨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文本中的“余一人”问题,不仅还原了西周时期“王臣”伦理关系的特定内涵,也为我们如何历史地、科学地解读诗礼文献文本提供了一个范例;《由清华简〈芮良夫谏〉之“五相”论西周亦“尚贤”及“尚贤”古义》(《学术月刊》),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结合,来讨论周人处理“王臣”人伦关系的基本准则,认为周人既重视血缘关系方面的“尊亲”,更注重人格品德方面的“尚贤”,使得出身异族或身份低贱者也能够入仕,逐步形成了与世族世官制度并行的举能荐贤制度。郝建杰《从〈魏风〉〈唐风〉军礼、嘉礼类诗歌看河汾文化区的孝道观》(《江海学刊》《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则从微观角度来回应“父子”伦理关系这一问题,认为春秋时期河汾文化区伦理道德规范层面“父子”伦理关系的孝道观,开始由宗亲之“孝”向君臣之“忠”转化,形成了以“孝”为

体、以“忠”为本的“忠”“孝”一体孝道观,并逐渐上升为整个华夏民族的一种文化精神和社会风尚。

另外,除了礼仪制度规范层面的“五礼”与伦理道德规范层面的“五伦”之外,广义的“礼制”还包括都邑制度、服饰制度、车马制度、官爵制度等其他制度规范。宁镇疆《早期“官人”之术的文献源流与清华简〈芮良夫毖〉相关文句的释读问题》(《出土文献》),从传世文献研读与出土文献释读入手,为研究周代官制奠定了扎实的文献基础,进而探究了西周春秋时期“官人”之法的源流;叶铸濂《〈诗经·邶风·定之方中〉春秋城建礼制管窥》(《人文论丛》),以春秋中期卫文公重新营建都邑这一重大事件为个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中期诸侯国“大役礼”的基本状况,进而探讨了春秋时期“军礼”与城建礼制对于维系国家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

三、“诗礼文化”的生成、流传与当代传承

“诗”与“礼”共生互渗是先秦时期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诗经》和周礼盛行的两周时代尤其如此。《诗经》是先秦诗性文化的艺术总结,礼制是先秦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二者自西周初期开始,日益密切联系、交融发展,形成宗周礼乐文明中诗礼相成的特殊文化现象——“诗礼文化”。因此本项目研究不仅要分析“诗礼文化”生成、流传的历史规律,阐发其蕴含的文化精神;而且还要研究对“诗礼文化”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基本路径。该研究层面既属于理论性总结,更属于现实性回应。

其中,邵炳军《从〈诗经〉与礼制的共生互动关系看诗礼文化的生成》(《江海学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从宏观视野探讨和回应诗礼文化的生成问题,认为在“五礼”“五伦”定型化过程中,周人通过建构“诗教”“礼教”“乐教”体系而逐渐形成了“诗礼文化”,经由历代王族宗子、公族宗子与家族宗子的大力倡导而不断完善,进而经由历代上自庙堂下自民间的创新性传承与创造性转化,逐渐成为华夏礼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

朱承《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哲学研究》),从“道”的公共性特质、公共性原则的伦理表现、个体修养的公共化路径、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等层面,探讨“公共性”范畴,为阐释“五礼”“五伦”如何由个体行为转化为群体行为,进而成为全社会成员必须恪守的礼仪制度规范与伦理道德规范,提供了坚实的学理

依据;《“君子”观念的理论反思》(《学术界》),则从人性论基础出发,讨论“君子”的功夫论意味与信念论价值,进而阐释其政治哲学意蕴,为阐释“君子”如何成为诗礼文化行为主体与传播主体,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儒家政治哲学的人格指向:以君子人格为例》(《探索与争鸣》),则从“君子”的个体修养指向和公共生活要求,来探讨“君子”价值指向的哲学意义。这些研究为诗礼文化生成、流传与当代传承奠定了哲学思想根基。

罗姝《王族宗子:文学创作的行为主体与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以春秋时期周王室诸王作家群体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公族宗子在诗礼文化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以春秋时期齐公室诸君的文学创作为中心》(《郑州大学学报》),旨在从王族、公族“宗子”的文学创作活动入手,来探讨宗法制度社会背景下“诗礼文化”生成与传承的主要渠道与内在机制;梁奇《〈孟子〉对虞舜孝行的书写与“忠”“孝”一体的理论构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以《孟子》为个案,探讨战国中期儒家学者对诗礼文化中“忠”和“孝”这两个重要理论范畴所进行的理论总结,以弘扬西周春秋时期诗礼文化精神的基本状况;杨秀礼《诗礼相成》(《光明日报》),以《诗》为个案,梳理春秋时期“诗礼相成”的演化历程,进而说明对西周传统“诗礼文化”创新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的基本途径。

还有宁镇疆、龚伟《由清华简〈子仪〉秦穆之歌诗说秦文化之“文”》(《中州学刊》),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探讨秦文化受周文化影响而彰显出来的人文性特色,构拟出诗礼文化区域性传承的个案,从一个侧面展示出诗礼文化是如何由一种部族性、区域性文化,逐渐融合成为一种全民性、社会性文化,并成为华夏文化核心要素构成的基本路径。

以上是我粗读《〈诗经〉与礼制研究》第一辑的一些体会,很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读者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无论如何,通过《诗经》文本研究,努力还原周代礼制,不仅是当前《诗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今天借鉴、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为我所用而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不仅乐见这个国家重大项目的立项,也乐见这项研究的顺利进展,更期待这项重大课题在首席专家邵炳军教授的带领下取得高质量、令人信服的最终研究成果。

是为序。

目 录

序	王长华 / 001
---------	-----------

• 上编 中国传统礼制的生成、定型及流变 •

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邵炳军 / 003
“德”观念的嬗变与春秋时期诫勉诗的演化	邵炳军 / 025
周礼与《诗经》关系探析	王 锸 / 040
礼乐互动中的《诗》	马银琴 / 050
风、风声、风刺以及《风》名的出现	马银琴 / 054
从春秋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看诗歌创作方式的转变	罗 姝 / 071

• 中编 《诗经》与“五礼”“五伦”的共生互动 •

从《椒聊》《蟋蟀》《山有枢》看春秋前期晋国礼仪制度规范的	
基本态势	邵炳军 / 085
“风”与“礼”	徐正英 / 095
也论“余一人”问题	宁镇疆 / 099
由清华简《芮良夫毖》之“五相”论西周亦“尚贤”及“尚贤”	
古义	宁镇疆 / 116
早期“官人”之术的文献源流与清华简《芮良夫毖》相关文句的	
释读问题	宁镇疆 / 136
饥饿体验与荒礼救护	
——《诗经》凶礼研究之一	罗家湘 王 璠 / 151
从《魏风》《唐风》军礼、嘉礼类诗歌看河汾文化区的孝道观	郝建杰 / 159

《周易》“丧马”为“反马”婚俗考论	杨秀礼 / 171
《诗经》“吉礼”类农祭乐歌的叙事结构形态发微	吕树明 / 182
《诗经·邶风·定之方中》春秋城建礼制管窥	叶铸璇 / 191

· 下编 “诗礼文化”的生成、流传与当代传承 ·

从《诗经》与礼制的共生互动关系看诗礼文化的生成	邵炳军 / 203
由清华简《子仪》秦穆之歌诗说秦文化之“文”	宁镇疆 龚伟 / 214
论朱熹哲学中的“公共性”思想	朱承 / 224
“君子”观念的理论反思	朱承 / 237
儒家政治哲学的人格指向：以君子人格为例	朱承 / 249
王族宗子：文学创作的行为主体与诗礼传家的责任主体 ——以春秋时期周王室诸王作家群体为中心	罗姝 / 260
公族宗子在诗礼文化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 ——以春秋时期齐公室诸君的文学创作为中心	罗姝 / 271
《孟子》对虞舜孝行的书写与“忠”“孝”一体的理论构设	梁奇 / 282
诗礼相成	杨秀礼 / 293
跋	/ 297



上编

中国传统礼制的生成、定型及流变

春秋政治生态变迁与 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演化

邵炳军

摘 要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渐次变迁,促使诗歌创作内容由以祭祀活动为主向以现实生活为主转变,从而使这一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诗歌主旨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前期以“王权”为中心,关注点为王室兴亡;中期以“霸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公室兴衰;后期以“族权”为中心,关注点为大夫专权;晚期以“庶民”为中心,关注点为“陪臣执国命”。这种政治化倾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关注点的不同,正好反映出诗礼互动内涵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诗歌创作政治化倾向与礼制变革现实性关照的有机结合,正是诗礼文化创造性传承与创造性发展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春秋时期 政治生态 诗歌创作 政治化倾向 演化

所谓文学创作的政治化倾向,是指政治生态环境——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相互联系的诸要素共同构成的一种政治体系运行现状和发展趋向的动态社会环境,对文学创作过程与创作内容发生影响后形成的一种文学现象。春秋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由“天子守在四夷”向“诸侯守在四邻”“守在四竟(境)”(《左传·昭公二十三年》)^①的渐次转变,政治生态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的渐次变迁,即由“王权”政治向“霸权”政治、“族权”政治、“庶人”政治的变革^②,那些身处社会变革大潮中的贵族诗人乃至平民诗人、奴隶诗人,自然会更加关注政治生态环境变迁进程中的重要政治事

① 本文所引《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尚书正义》《礼记正义》《论语注疏》文本,皆据: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不再逐一标注页码。

② 笔者此所谓“庶人”,亦称“庶民”,指士之庶子无爵者,包括担任王室与公室府、史、胥、徒之属者及大夫家臣者。其虽可入仕在官,但并非由天子、国君任命。故就社会阶层而言,属于平民阶层。

件,其诗作自然会更加强调干预社会现实生活的政治功能。据笔者考证,这一时期传世诗作凡 229 篇,主要有今本《诗经》所载诗歌 183 篇,传世文献所载贵族佚诗 32 篇、平民与奴隶歌谣 14 篇。其中,直接或间接与政治事件相关者就有 177 首,比例高达 77%。当然,由于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生态环境构成要素的差异性,导致政治文化介入诗歌创作的方式与程度不同,这种政治化倾向的表现形态自然会呈现出时代特征。

一、“王权”政治生态与诗歌政治化倾向的基本特征

春秋前期(前 770—前 682)^①,尽管王权受到严峻挑战,但政治格局依然是“天子守在四夷”,政治生态依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格局、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综合状态与环境依然是以王权为中心。在“王权”政治生态环境中,诗歌创作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正雅”息,“变雅”盛;“正风”歇,“变风”兴。这一历史阶段传世的诗歌作品凡 135 首(含逸诗 2 首),占春秋时期诗歌总数 229 篇的 59%。其政治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怨刺先王覆亡宗周

幽王十一年(前 771),骊山之难、西周覆灭^②。这是周王室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彻底改变了西周立国以来的政治生态环境。故像王室“三公”摄司寇卫武公和、卿士凡伯、宰夫家父(家伯父)及佚名之王室大夫等贵族诗人,其笔触多集中于此。

他们或闵宗周颠覆——“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王风·黍离》),或伤骊山之难——“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小雅·四月》),或刺幽王以戒平王——“家父作诵,以究王讟”(《节南山》),或刺幽王听信谗言而伤贤害忠——“谗人无极,构我二人”(《青蝇》),或刺幽王宠信褒姒以致灭国——“艳妻煽方处”(《十月之交》),或刺幽王致使宗周灭亡——“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正月》),或刺幽王友戎狄而仇诸侯以灭国——“舍尔介狄,维予胥忌”(《大雅·瞻卬》),都从不同侧面

① 笔者将春秋时期分为前期(前 770—前 682)、中期(前 681—前 547)、后期(前 546—前 506)、晚期(前 505 年—前 453)四个历史阶段。详见:邵炳军. 春秋文学系年辑证·绪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9-11.

② 本文列举史实,除特别标注者外,皆出自《春秋》《左传》《国语》《论语》《礼记》《韩非子》《孔子家语》《史记》《列女传》《吴越春秋》,不再逐一标注出处。

经验教训。这种以史为鉴的文化精神，表现出诗人对“王权”政治的高度关注^①。

比如，《瞻卬》首章“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蠹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写亡国之象——天降灾祸而士民忧患；五章“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尔介狄，维予胥忌。不吊不祥，威仪不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写亡国之因——夷狄入侵而贤者离居；六章“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抒忧伤之情——天降灾害而国家危殆；卒章“霱沸檻泉，维其深矣。心之忧矣，宁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言离乱之苦——天灾泛滥而生不逢时。足见诗人在上述四章中，侧重写骊山之难后的亡国之象。次章“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夺之”，则侧重反映了西周末期土地关系的转变——土地兼并现象，天子将贵族们的土地与民人皆占为己有；三章“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选取恶声、不孝、恶灵之鸟“枭”“鸱”来经营意象，象征褒姒乱政祸国。足见上述两章揭示出幽王之所以亡国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原因。正是诗人具有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表面上说“哲妇倾城”，似极言女祸之害，实际上批判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哲夫”——幽王宫涅。

2. 诚勉与颂美时王中兴王室

幽王身死而西周覆亡之际，王室卿士虢公翰拥立幽王庶子余臣为王（史称“携王”），与先前在西申（姜姓申侯之国，为幽王太子宜臼嫡母申后宗国，地在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附近）僭立为王的废太子宜臼（史称“天王”，即周平王），形成了“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局。面对这一政治格局，在依然恪守王位嫡长子承袭制这一宗法背景下，像卫武公和、晋文侯仇、郑武公滑突、秦襄公等大国诸侯及王室中的许多佚名公卿大夫，大都选择了支持“天王”。尤其是卫武公、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夹辅周室、不废王命，帅师护送平王自镐京（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沔水东岸）东迁雒邑（即“王城”，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位于瀍水以西）。他们之所以成为“天王”政治营垒的股肱之臣，自然是冀望其能够中兴王室；当然，“天王”自己亦有中兴王室之志。故像周平王、卫武公及佚名之王室大夫等贵族诗人，其笔触多集中于此。

^① 关于本文所涉诗篇的作者、诗旨与创作年代，笔者《春秋文学系年辑证》有关部分与已发表的相关论文有详细考证，可参。

他们或美平王燕群臣典乐之盛大——“是日既醉，不知其秩”(《小雅·宾之初筵》)，或美平王自西申归镐京之仪态——“其容不改，出言有章”(《都人士》)，或美平王在镐京宴享群臣之欢乐——“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鱼藻》)，或美平王东迁途中先养后教之明王形象——“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绵蛮》)，或美武士送平王东迁途中不畏劳苦之武士精神——“武人东征，不皇(遑)朝矣”(《渐渐之石》)，或美平王在雒邑策命燕享有功诸侯礼节之隆重——“钟鼓既设，一朝飨之”(《彤弓》)，或祈愿平王东迁雒邑后能修御备保其家邦——“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瞻彼洛矣》)，或诫勉平王东迁雒邑后能以史为鉴中兴王室——“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大雅·抑》)，都以不同方式表达出诗人对幽王继任者平王的崇敬之意，寄托了对平王中兴王室的殷殷之情。

比如，《抑》首章“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告诫平王敬慎威仪以显德；次章“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告诫平王潜心修德以治国；六章“无言不讎，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告诫平王要使王令中理以明德；九章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告诫平王听受善言是敬慎威仪的直接体现。可见，诗人以富有哲理的语言，委婉娴雅的风格，从潜心修德、敬慎威仪、乐闻善言、政令中理四方面反复诫勉，循循善诱，字里行间透露出卫武公对周平王中兴王室的殷切期望。

3. 赞美与诫勉时君文德武功

这一时期的诸侯国君大多为贤明之君，文德懿美、武功卓著，如卫武公和“箴傲于国”(《国语·楚语上》)，晋文侯仇“克慎明德”(《书·周书·文侯之命》)，郑武公滑突“善于其职”(《诗·郑风·缁衣》毛《序》)，秦襄公“将兵救周”，秦文公“以兵伐戎”(《史记·秦本纪》)，等等；诸侯国君夫人大多为贤惠之君^①，莼亲之阙、妇道肃雝，如齐桓夫人王姬(共姬)“敬事供上”(《逸周书·谥法解》)，卫庄夫人庄姜“淑慎其身”(《邶风·燕燕》)，等等。故周平王及周大夫、卫大夫、郑大夫、齐大夫、秦大夫、召南人(国人)、卫人、齐人、秦人、秦宫女等许多佚名贵族诗人与平民诗人，多赞美与诫勉之。

他们或美王姬下嫁齐桓公时之盛大场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召南·鹊巢》)，或美王姬下嫁桓公时之敬和情态——“曷不肃雍，王姬之车”(《何彼秣矣》)，或赞卫武公修身治学精益求精之盛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卫

^① 国君夫人，《左传》称“小君”，《论语》《礼记》称“寡小君”。则其亦为“君”，社会地位与其夫同。